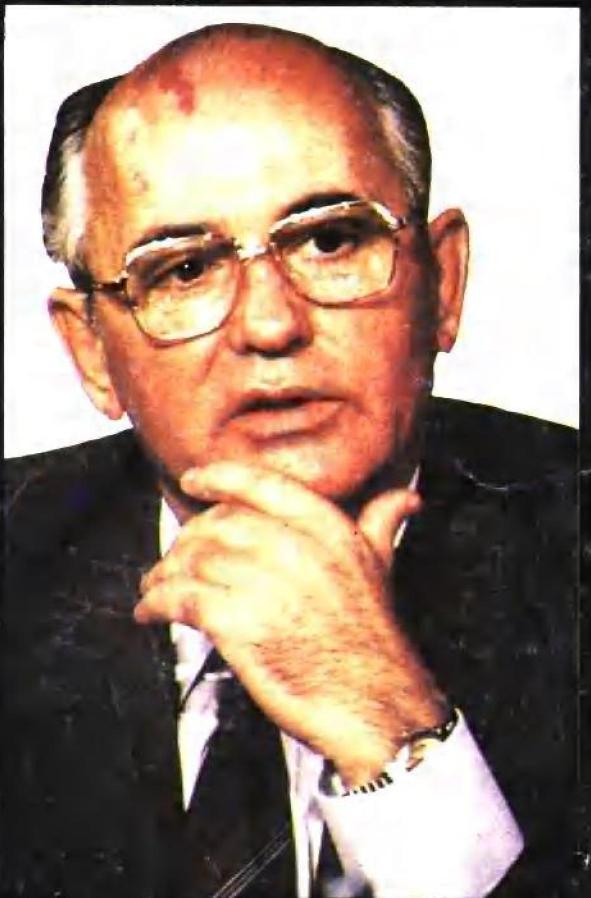


GORBACHEV



戈尔巴乔夫

〔苏〕若列斯·麦德维杰夫 著

王德树等 译

华夏出版社

GORBACHEV

by

Zhores Medvedev

Basil Blackwell Ltd., Oxford, UK, 1986

戈 尔 巴 乔 夫

〔苏〕若列斯·麦德维杰夫 著

王德树 等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头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华书店 经销
金城印刷厂 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202千字
1987年9月北京第1版 198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4,700册
ISBN7-80053-081-7/K·005
书号：11484·005 定价：1.70元

• 出 版 说 明 •

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前任总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于1985年病逝后开始担任这一职务的。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31年3月2日出生于北高加索赤卫队区普里沃尔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在读高中时，家境不富裕，常常利用假期到当地农田干活，是联合收割机手。1950年，考入国立莫斯科大学，攻读法律。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5年毕业后，回到故乡斯塔夫罗波尔，担任共青团市委第一书记和共青团边疆区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到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函授班学习，1967年毕业。1970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的代表。1971年，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委员。1979年，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80年10月22日，也就是在他49岁的那一年，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戈尔巴乔夫同他的几个前任相比，是最年轻的苏共领导人。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引起舆论界的广泛注意。《戈尔巴乔夫》一书，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于1986年问世的。

该书既是系统描述戈尔巴乔夫个人成长的一部政治传记，又是记录苏联各个时期，特别是70年代以来演变的历史书籍。

该书作者若列斯·麦德维杰夫是位苏联生物学家，也是研究苏联问题的著名学者。他撰写的著作颇丰，主要有：《苏联科学》、《李森科沉浮录》、《赫鲁晓夫执政年代》、《谁是疯子？》、《安德罗波夫：他的生和死》等。

1973年，麦德维杰夫赴英国访问时，苏联当局吊销了他的护照，因而留在英国。现在在英国皇家医学会从事研究工作。作者对历史的记述，持认真客观态度；在对苏联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主要领导人以及苏联政治现状的分析和论述上，仍带有某些西方色彩，有些理论观点我们是不能苟同的。为了向我国读者及时地提供这方面的资料，我们翻译出版了本书。供读者研究参考。

1987年4月

• 前 言 •

领导的继承，不只是意味着新领导人的上任，并且有可能实行新的政策，这在苏联的历史上还是首次。戈尔巴乔夫的继承，标志着在作风、知识和历史观上都不同于老近卫军的政治上新一代的出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都是在斯大林时代被提拔到权力职位上来的。到 1953 年，他们都已经成了思想成熟、经验丰富的党的职业工作人员。他们斯大林主义的过去是他们获得进一步提升的最重要的资本。反之，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则代表着战后较年轻的一代，这一代是在比较自由的赫鲁晓夫时代开始其政治生涯的。

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通常被认为是“领导统治政权”，这是对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政治体制的生动描写。但是，1964 年赫鲁晓夫的下台和勃列日涅夫（他把自己很大一部分决策权交给了官僚机关）的上台，严重削弱了领导人的个人权力。而在大多数其他苏联集团的国家里，斯大林主义的领导结构及其不可避免的“个人崇拜”实际上仍然原封未动。在苏联，个人领导权力的削弱是与领导人的性格而不是与结构上的变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纵然这种制度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但是它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却变得更加保守了。

勃列日涅夫所关心的是以勋章、称号、荣誉、甚至是以职位这种实质性利益的形式来积累表面上的权力象征，他喜欢充当党和国家的“首脑”，而不喜欢做“统治者”。安德罗波夫试图掌握较大的个人权力，但是他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的体制。契尔年科根本就没有试图使这个体制比较有效率，因此使苏联行政管理体制的声望更加明显地下降了。从 1974 到 1984 年领导苏联的那些老态龙钟的病夫与年轻有为、精明强干、朝气蓬勃和精力充沛的戈尔巴乔夫之间的这种鲜明对照，立即引起了人们对这位苏联领导人的个性的注意。它还引起了人们对根本改革和变革的希望。

苏联历史上每个领导的末期都使社会处在危机的状态之中，这就使每次继承远不是一个更换人员的问题，每个新领导都使用十分不同的方法来达到自己政治上的目的。在斯大林时代，这种更换是与严酷的斗争分不开的。赫鲁晓夫起初是通过党的机关来实行统治，他的主要权力基础仍然是中央委员会和州委的首脑（他们的地位和生活由他来保证）的支持。结果出现了一个权力更大的官僚阶层。这个具有高度安全感和稳定性的集团的利益在赫鲁晓夫的下台和勃列日涅夫的继任中表现出来了。在苏联集团的较小国家中，决策权仍然掌握在个别领导人手中。但在苏联，由于经济、政治和军事体制比较复杂，因此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已经很困难了，反而，一个新的职位稳定不变的党和政府的权力集团已经开始形成。过了几乎 20 年以后才证实，他们缺乏创造性，工作效率低下，思想保守。它阻止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复兴，因而最后退化成老人执政而对其存在的唯一自然限制就是疾病和死亡。这种退化的最后象征是三位总书记在不到 3 年的时间内相继死在任上。

与这种退化分不开的那种不稳定性和优柔寡断似乎已经结束了。戈尔巴乔夫的继承是与权力从老一代过渡到年轻的、受过良好

教育的一代政治领导人、从党的官僚政治过渡到党的专家政治密不可分的。在以前的继承中，巩固领导人的权力通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与任命和提拔那些常常不称职的忠实信徒和朋友在政府和政治局里担任关键职位联系在一起的。说戈尔巴乔夫的继承将不照搬这种形式，还为时过早，但由于 1979 至 1984 年缓慢的、但确实已经发生的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因此不仅必须提拔忠诚的人，而且还必须提拔比较精明强干、年轻有为、管理水平高的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戈尔巴乔夫的继承标志着苏联重要政治变革的开始。

与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不同，戈尔巴乔夫似乎想加强总书记职位的权力和影响，恢复领导人的形象，使其显得能够鼓励人们努力工作，出色完成任务，取得更具实质性的成果。但是，他那非凡的个人感染力也许不能在幻想破灭的苏联人民身上创造出奇迹来。农民和知识分子都同样渴望改革，而不是渴望决议；渴望有一个比较开放和自由的社会，而不是渴望实行限制和高压统治。已经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影响了西方人生活的科学技术革命，却没有对刻板的和更加官僚主义的苏联经济体制产生同样的影响。苏联领导人选择处理国内危机和国际问题的方法和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品质、他的政治见解、知识、智力和他在试验不同方法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在政治上很可能不可避免的是，他将乐于使用安德罗波夫所实行的那种强硬的、惩罚性的方法，使苏联再次向前迈进。同样可能不可避免的是，他与苏联和西方公众的蜜月时期将证明是很短的。他是否能够改变苏联的发展进程？他将如何明智地使用其职位上的巨大权力呢？这些就是这部传记试图回答的问题。

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写成，是由于我本人长期以来一直对 40 年代末以来的苏联政治发展和苏联农业、经济和科学的情况感兴趣。在 40 年代，由于李森科的伪科学思想完全统治着生物学和农学，

因此任何有自尊的科学家如果不冒政治上的个人风险，就很难继续进行真正的研究。做真正的科学家就必须不仅研究科学，而且还要研究政治体制及其变革。

非常感谢我的兄弟罗伊，因为他所写的关于斯大林、“斯大林周围的人”和赫鲁晓夫的书以及关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和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继承的论文，对我了解苏联的政治发展有很大帮助。他还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给我寄来了苏联专业报刊和一般报刊上的文章，这些文章使我在被迫从这个国家流亡到国外期间清楚地了解到了苏联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我还可以看到很多没有发表的《地下刊物》上的作品，并把国内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资料、流亡者的和西方的资料加以比较，从而用我自己的判断来选择最可靠的资料。

十分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们，因为我发现在写这本书时征求他们的意见要比我3年以前写安德罗波夫传时要容易得多。我还十分感谢萨里大学的马戈特·莱特在本书的写作阶段所给予的帮助。

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

• 目 录 •

前 言 (1)

第一部分 总书记的成长道路

第一章	总书记死了，总书记万岁！	(3)
第二章	青少年时代	(24)
第三章	在斯塔夫罗波尔的年轻的戈尔巴乔夫	(47)
第四章	边疆区委书记	(69)
第五章	在政治局里主管农业	(98)
第六章	安德罗波夫的盟友	(123)
第七章	第二号人物	(141)

第二部分 执政的戈尔巴乔夫

第八章	调换克里姆林宫的卫兵	(169)
第九章	使国家向前迈进	(188)
第十章	国内政策	(214)
第十一章	新的外交，老的外交政策	(231)
结束语		(249)

第一部分

总书记的成长道路

第一章

总书记死了，总书记万岁！

1985年3月11日，要求人们不仅哀悼他们的领导人的逝世，而且同时要求人们祝贺新的领导人的继承，这在苏联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只是由于苏联远东、科雷马和堪察加与莫斯科相隔7、8、9个时区，因此新领导人的名字直到第二天即3月12日凌晨才传到。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有记录以来最容易的一次继承。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宣布通告的速度表明，这个决定是匆忙作出的。

3月12日，苏联各报纸都在第2版上刊登了已故领导人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照片和他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戈尔巴乔夫的像片和传记刊载在第一版上。这是异乎寻常的。但是，要是把这一讣告和继承的消息与1982年和1984年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逝世后的近期报道相比，那就更加异乎寻常了。没有发表提名讲话。据报道，葛罗米柯发表了讲话，但原文没有发表。这只能意味着，这是一篇自发的、没有经过精心准备的讲话。另外，还有一个不同之处，而这一点我是很久以后才注意到的。印在第2版四周的哀悼的黑框架相当狭窄。只有为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所使用的框架的一半宽（是3毫米而不是6毫米）。但仍然比在第2版上宣布象乌斯季诺夫元帅（他已在几年以前逝世）这样的高级政

治局委员逝世的消息时所使用的框架要宽 1 毫米。毫无疑问，这没有为真正的领导人举行的那种正常的深切哀悼那么重要。以戈尔巴乔夫为主席的治丧委员会对葬礼的安排似乎是很匆忙的。向遗体告别仪式要比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的少一天。向已故的同事告别的政治局委员的照片是 9 个人，而不是全部 10 个人。乌克兰党的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密友谢尔比茨基不见了。他从 3 月 8 日起率领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在美国访问。3 月 8 日，他会见了里根总统。3 月 9 日，他还要在华盛顿会见其他官员，然后再启程去得克萨斯州。让他终止旅行回莫斯科的电报是在他到达加利福尼亞时收到的，这里离莫斯科太远，无法进行直达飞行。他不得不在古巴换乘飞机，结果，不仅没有赶上政治局会议，而且也错过了非常中央全会。

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于 1985 年 3 月 10 日逝世。中央委员第 2 天被立即召到莫斯科开会这一事实本身就清楚地表明，戈尔巴乔夫决定在契尔年科逝世以后立即在政治局紧急会议上讨论继承问题。一些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报道说，政治局会议是在契尔年科逝世后 3 个小时召开的。^①按照惯例，确定新领导人的中央非常全会不用说只有在政治局这一级达成一致意见以后才能召开。全会仅仅是确定这一任命。把中央委员的法定人数从苏联各地聚集到莫斯科至少需要 10 个小时，但是没有组成政治局委员的法定人数的规定，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到会的政治局委员即使只有 3、4 个人也有权作出决定。列宁在 1918 年建立政治局的时候，中央委员会是由 18 个男人和 1 位妇女组成的，其中 5 人被任命为政治局委员。现在政治局会议仍然遵循列宁关于会议程序的规定，而且这些规定并不包括必须够法定人数——当时正在进行国内战争，因而并不拘泥于形式。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经常

^① 《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记者杜斯科·多德尔。载华盛顿邮政局《国际先驱论坛报》，1985 年 3 月 19 日。

因军务不在莫斯科，通常只有 3 位政治局委员在莫斯科，而且其中 1 人即克列斯廷斯基还常常反对列宁。因此，列宁和加米涅夫就以政治局的名义单独作出很多决定。

没有严格的规定这一点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是个有利条件。3 月 10 日，有 3 位政治局委员在外地：谢尔比茨基在美国，沃罗特尼科夫在南斯拉夫，库纳耶夫在阿拉木图。阿拉木图离莫斯科要坐 5 个小时的飞机，离克里姆林宫还要更长些时间，近 6 个小时。安德烈·葛罗米柯很可能是戈尔巴乔夫的唯一支持者，因为他深切地关心这个国家，而不是考虑自己的命运。他的地位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牢靠的，而且作为世界上任期最长的外交部长，保卫苏联的利益是他的职责。对所有其他的人来说，由谁来担任新的总书记的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他们未来生涯的问题。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被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的盟友，但是他的支持很可能是有条件的。在吉洪诺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位或者逝世以后，雄心勃勃和成就卓著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盖达尔·阿利耶夫成了他取得政府里这一最高职位的竞争者。正在为戈尔巴乔夫争取多数的葛罗米柯大概认为，在安德罗波夫选择担任这一职位的人沃罗特尼科夫仍然在南斯拉夫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对付阿利耶夫的。

在莫斯科和国外，每个人都很清楚，契尔年科本人选择的继承人是莫斯科市委书记维克托·格里申。选择他对以前的勃列日涅夫帮来说是可靠的，而且谢尔比茨基和库纳耶夫都愿意支持他。戈尔巴乔夫的劲敌格里戈里·罗曼诺夫也愿意支持格里申，因为他本人当选的机会已经很小了。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的密友、老态龙钟的吉洪诺夫的地位是无庸置疑的。剩下的一个人物就是面无表情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他很可能被说服支持戈尔巴乔夫，但是他也可能一反常态，与他的老对手沃罗特尼科夫合作。直到 1983 年为止一直担任俄罗斯社会主义联

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的索洛缅采夫与他的较年轻有为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沃罗特尼科夫不和，这导致了沃罗特尼科夫 1979 年被“荣誉”地流放到古巴。任命担任大使是勃列日涅夫的拿手好戏。安德罗波夫虽然承认沃罗特尼科夫的行政管理才能，但没有让他回莫斯科，而是让他接任了索洛缅采夫的职位。索洛缅采夫则“步步”高升，担任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他取代了阿尔维德·佩尔谢，佩尔谢于 1983 年逝世，享龄 84 岁）。

如果契尔年科再活上 1 个月，戈尔巴乔夫就很可能没有机会担任总书记了。总书记一生病，就立即开始准备由总书记亲自提名的排练得很好的权力移交。勃列日涅夫帮（在勃列日涅夫逝世以后由契尔年科领导）在安德罗波夫逝世以后进行了一次惊人的复辟。有人认为，契尔年科能活到 1986 年 2 月的第 27 次党代表大会。在他健康状况恶化的时候，代表大会将提前到 1985 年 11 月召开。^① 戈尔巴乔夫不能指望从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得到什么积极的东西。他负责多年的农业很可能成为讨论的主要议题，而且他也不会得到好评。1985 年初，契尔年科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看来不可能活到 11 月。契尔年科准备在 3 月下旬召开的例行中央全会上正式辞职。事实证明，就是这一点也太乐观了，有秩序的权力移交的机会已经消失了。

要得到政治局全体一致同意继承人的提名绝非易事，戈尔巴乔夫的情况也毫不例外。有 5 名政治局委员，如果给他们足够的时间，会阻止对戈尔巴乔夫的提名的。只有葛罗米柯完全无条件地支持戈尔巴乔夫。当时的中央全会仍然受忠于勃列日涅夫的追随者所控制。在这些追随者当中，有很多人对下述一点已经不抱幻想：如果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书记，他们将在下一次代表大会召

^① 中央委员会指示各地方组织开始为定于 1985 年 11 月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做准备。这一指示并没有打算发表，但有些地方报纸却发表了代表大会提前召开的消息。参见《东方真理报》1985 年 3 月 3 日。

开之前或以后退休或被撤销州级或部级的职务。由这些人控制的中央全会来确定戈尔巴乔夫当继承人当然是很没把握的。对戈尔巴乔夫的最好机会是，政治局能否在谢尔比茨基、库纳耶夫和沃罗特尼科夫回来之前迅速作出决定。尽管那样，葛罗米柯重要的外交经验也是必不可少的。

戈尔巴乔夫自从安德罗波夫逝世以后就是苏联领导中的第二号人物，这在苏联和国外都是众所周知的，但这却不能保证他在契尔年科辞职或逝世时的晋升。在任何权力体系中，第一号职位和第二号职位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同，选举继承人始终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困难重重的过程。虽然看上去戈尔巴乔夫的影响在安德罗波夫逝世以后已经开始增长，但他却无法在 1984 年增加他的“政治资本”。很清楚，在安德罗波夫逝世以前，他就被推荐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担任继承人了。在安德罗波夫 1984 年 2 月逝世时，戈尔巴乔夫成了权力的竞争者，他确实没有担任这一职务的足够威信，也没有担任这一职位的成功经验或适当的资历，他仍然担任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农业部门的首脑。但是自从他在 1978 年底就任这一职务以来，农业工作却搞得一团糟。1983 年是第 5 个歉收年，而且还很难把这一失败归咎于气候不好。因此，在安德罗波夫逝世时，政治局进行了 3 天激烈的争论，随后由契尔年科出任总书记，不过对他的任命则附加了很多条件，即必须坚定地许诺继续执行“安德罗波夫路线”，不得试图恢复勃列日涅夫的已经使人怀疑的政策。很清楚，契尔年科的晋升是一种妥协，而他也只想当一个过渡性的领导人。这是一场轻取的胜利，他的主要优点是他身体虚弱。他不会活很长时间，因此他无法巩固自己的权力。这种妥协显然使中央委员们感到宽慰。在契尔年科的领导下，安德罗波夫的反贪污腐化路线再也不会威胁他们了。形式上的“团结一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重要的。尽管在这 300 名超级权力者中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部意见分歧与不和，但是他们当中

任何人都不会戳穿关于政治局才智过人、中央委员会一贯正确等神话。

戈尔巴乔夫成了正式的第二号人物，而在契尔年科生病或休假时，则成了中央书记处的正式主席（没有政治局主席的正式职位）。起初有人想当然地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职责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按照确定的传统，第二号人物掌管“意识形态的文件夹”，负责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控制宣传工具和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外关系，这种关系是以党的联系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它不同于与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和中国的传统的外交关系，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由外交部在克格勃和军队情报部门的协助下来处理）。但是，契尔年科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是显示自己工作能力的主要领域，因此不愿意让戈尔巴乔夫主管中央委员会的意识形态部门。总书记有亲自主管党的某个部门的特权。此外契尔年科当然知道，农业可能是领导人的坟墓。戈尔巴乔夫负责那个不现实的“食品纲要”（这个纲要他已经帮助制定出来了）的时间越长，他的地位就越虚弱。无论他获得了什么表面权力的迹象。契尔年科的计划在1984年得到了优厚的报答，因为这一年的农业情况极为糟糕。在年底没有报道农业生产的数字，根据美国的可靠估计，1984年苏联粮食总产量为170亿吨，比计划的目标少70亿吨，^①这还没有60年代的平均水平高。为了减少食品和饲料的短缺，苏联不得不创纪录地进口粮食（50亿吨）这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是一场个人灾难。不过，更为沉重的打击是乌斯季诺夫的逝世。

乌斯季诺夫的逝世并不完全是出人预料的。自从他没有出席1984年11月7日红场上的检阅以来，就有报道说，他患“感冒”了。感冒发展成肺炎，但这并不是致命的。到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对英国进行成功的旅行时，乌斯季诺夫由于不小心而旧病复

^① 外国农业通报：《粮食：苏联的粮食形势和展望》，美国农业部，1985年5月，第5页。